



## The Genealogy of World Consciousness in Chinese Literary Theory in the Past Seven Decades

Li Yong

**Abstract:** There have been four kinds of world consciousness in Chinese contemporary literary theory over the past seven decades after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From the 1950s to the 70s, Chinese literary critics accepted a world consciousness of bipolar confrontation, by which the world was divided into two camps of socialism and capitalism, with the class theory as its theoretical foundation. Since the 1980s, three kinds of world consciousness have come into being: the world of reconciliation, the world of multi-cultures and the world of community. The world consciousness of reconciliation was formed in the early 1980s, when the policy of reform and openness enabled Chinese literary critics to see the tremendous changes the world had undergone over the past and see the gap between China and the world. They hoped that China could integrate itself into the world and catch up with the pace of world development. Therefore, "the world of reconciliation" showed an open, worldly outlook held by Chinese scholars. They tried to connec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with Western literary theories and integrate Chinese literary theory into a greater scholarly arena. Naturally, there also occurred the idea of equating the West with the world and mechanically using Western literary theory to dissect its Chinese counterpart. In the 1990s, Chinese literary theorists realized that the world was made up of different ethnicities and different cultures and different cultures should treat each other equally and coexist peacefully, with respect for cultural differences. In a multicultural world, different cultures should observe the principle of "harmony in diversity" and should not use some strength to replace or dissolve other cultures. Over the last decade, when discussing world literature and cosmopolitanism, Chinese literary theorists have formed the world consciousness of community, regarding all humanity as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As different cultures are engaged in the course of communication, dialogue and integration, they go through thick and thin and share weal and woe; no member of the community shall, for its own interests, do harm to the interests of the community or to those of other members. Rather, they should benefit by cooperating with other members and by working in the community. If the four kinds of world consciousness are put together, it is clear that the world of bipolar confrontation and the world of reconciliation are two different solutions to the same problem. It is a question of how to be integrated into the world. The world consciousness of multi-cultures and that of community are dialogues on how to integrate into the world. In the study of Chinese literary theory, different kinds of world consciousness directly affect the attitude towards foreign theories and affect the style and depth of literary theory research. Only by choosing communication and dialogue with other nations and by stepping out of the closed space of a self-centered culture can we develop ourselves by understanding other cultures and absorbing their beneficial elements. While we develop ourselves, we can gain respect of other cultures by providing them with the elements they need, and this enables us to achieve a place we deserve in an increasingly harmonious global culture.

**Keywords:** world consciousness, Chinese literary theory in the past seven decades, community, cosmopolitanism

**Author:** Li Yong received his bachelor's from Anhui Normal University in 1989, his master's from Xiamen University in 1995, and Ph.D. in literature from Soochow University in 1998. He is currently a professor and doctoral supervisor at the School of Literature, Soochow University. His research focuses on Western literary theories and trans-cultural studies. His major publications include *The Paradigm Transformation of Chinese Contemporary Literary Theory*, *The Image of China in Western Europe*, *The Theory of Popular Literature*.

## 中國文論七十年的世界意識譜系

李勇



[摘要]新中國建立後的七十年裏，中國文學理論界相繼形成了四種世界意識。20世紀50—70年代，中國文論界接受的是一種兩極對立的世界意識，世界被劃分為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大陣營，其理論基礎是階級論。80年代至今，又相繼形成了和解的世界、多元文化世界、共同體世界這三種世界意識。和解的世界意識形成於80年代初，改革開放使中國人認識到了世界發生的巨大變化，認識到了中國與世界的差距，中國希望融入世界，趕上世界發展的步伐；因此，“和解的世界”就是中國學者形成世界性開放視野，將中國傳統文論與西方文論對接，使中國文論融入一個更大的學術場域。當然，其中也出現了把西方等同於世界、用西方文論剪裁中國文論的生搬硬套。90

年代，中國文論界認識到，世界是由各民族不同文化構成的，不同文化之間應該平等相待、和平共處，文化之間的差異應該得到尊重，在一個多元文化的世界中，各不同文化應該遵守“和而不同”的原則，不應該由某種強勢文化去替代、消解其他文化。最近十年來，中國文論界在討論世界文學與世界主義問題時，又形成了共同體的世界意識，把全人類看成一個命運共同體，各種文化處在一個交往、對話、融合的過程中，休戚與共，共享共生，任何一個成員都不應因自己的利益而損害整體利益，也不應損害其他成員的利益，應該從與其他成員的合作中、從共同體中獲益。如果將四種世界意識聯繫起來看，兩極對立的世界、和解的世界這兩種意識是一個問題的不同解答，問題的癥結就是以什麼理念融入世界；多元文化世界意識、共同體世界意識則是圍繞怎樣融入世界問題進行的對話。在中國文學理論研究中，不同的世界意識直接影響到對待外國理論的態度，也影響到文學理論研究的格調與深度。祇有選擇與其他民族交往對話，走出自我文化的封閉空間，纔能通過瞭解其他文化而吸收其有益的成分來發展自己；同時，也為其他文化提供其所需的成分從而得到對方的尊重，在一個更和諧的全球文化中獲得應有的位置。

[關鍵詞]世界意識 中國文論七十年 共同體 世界主義

[作者簡介]李勇，1989年在安徽師範大學獲文學學士學位，1995年在廈門大學獲文學碩士學位，1998年在蘇州大學獲文學博士學位，現為蘇州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從事西方文學理論、跨文化研究，代表性著作有《中國當代文藝學的範式轉型》《本真的自由——林語堂評傳》《西歐的中國形象》《通俗文學理論》等。

世界意識是對於世界格局的自覺理解、想象與話語建構，是一個民族國家認識自己所處世界的基礎。世界格局的整體狀況，不同民族國家、不同文化之間的關係，以及本國對待他國的態度或對外關係等一系列問題，都是以世界意識為基本前提的。“世界意識”不僅是政治或外交領域的範疇，也是一種文化範疇。在文學理論研究中，它直接影響到如何對待外國理論的問題，是學習借鑒還是批判拒斥，是引進來還是送出去，都與世界意識有直接的關聯。新中國建立後的七十年裏，中國文學理論界先後形成了兩極對立的世界、和解的世界、多元文化的世界、共同體世界這四種意識。然而，這四種世界意識各有哪些內容？不同的世界意識之間有什麼關聯？文論話語又是如何表達對世界格局或不同文化之間關係的認識的？本文試對此予以探討。

## 一 兩極對立的世界意識

20世紀50—70年代，中國文論界接受的是一種兩極對立的世界意識。世界被劃分為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大陣營，其理論基礎是階級論，“不是東風壓倒西風，就是西風壓倒東風”則是這種兩極對立世界的形象化表述。鑒於當時所處的國際環境，國家最高決策層的指導性理念是：“‘你們一邊倒。’正是這樣。一邊倒，是孫中山的四十年經驗和共產黨的二十八年經驗教給我們的，深知欲達到勝利和鞏固勝利，必須一邊倒。積四十年和二十八年的經驗，中國人不是倒向帝國主義一邊，就是倒向社會主義一邊，絕無例外。”<sup>①</sup>為了使新生政權鞏固、發展、壯大，中國不僅在政治上與蘇聯站在一邊，而且在經濟、軍事、文化、教育等各個方面都向蘇聯模式學習，甚至兩極對立的世界意識本身也主要來自蘇聯的影響。周揚（1908—1989）在1951年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說道：“……應該繼續反對文藝教條主義，反對崇拜西洋的思想；如果不反對這個東西，我們進城以後，文藝中盲目崇拜西洋的傾向就會抬頭。蘇聯搞了三十年了，到現在還有崇拜西洋的，他不崇拜俄國，他不崇拜蘇聯，他崇拜外國——英國、美國、法國，就是世界主義。這是資產階級思想的影響。我們應該看到這一點，這個影響是很大的。不要講中國的資產階級弱，中國內有資產階級存在，外有帝國主義包圍，外國的資產階級思想也傳到中國來了，所以盲目崇拜西洋，這個問題相當嚴重，這個工作是長期的工作。”<sup>②</sup>中蘇友好同盟分裂之前，中國文論界一邊倒地接受了蘇聯的文藝學體系；分裂之後，儘管適時調整了“一邊倒”策略，提出了“洋為中用”思想和“三個世界”理論，但由於國家還未統一，周邊局勢動蕩，兩大陣營對立的“冷戰”格局沒有實質性改變，所以在意識形態上仍保持了某種連貫性。

這種連貫性之所以能夠保持，還有幾個深層次原因：其一，劃分成對立世界的理論基礎是階級論。按照馬克思（K. H. Marx, 1818—1883）當初的設想，社會主義革命運動是一種超越國界的世界性革命，“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就注入了世界主義的因素。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形成的“冷戰”格局，使得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對立成爲一種世界性對立，從這個意義上說，它是符合馬克思對社會主義革命的預想的。所以，在此基礎上，社會主義中國把世界看成兩極對立的世界就成爲必然。後來發展出來的“三個世界”劃分的理論，也是階級論的延續——亞、非、拉第三世界國家組成的新陣營仍然是一個社會主義陣營，而美蘇兩霸都是資本主義的高級階段——帝國主義的代表。其二，“三個世界”的劃分雖在某種程度上對民族主義與階級論作了調和，但第三世界中的亞、非、拉民族國家之間又以社會主義爲紐帶結成新的陣營，使得階級論的主基調並沒有改變，蘇聯被認爲是從修正主義發展成了社會帝國主義。其三，在“三個世界”理論中，世界革命與國際主義思想仍然在延續，中國代替蘇聯成爲世界上最大的社會主義國家，並履行着世界革命領導者的義務；蘇聯之所以變成帝國主義，也是因爲它沒有履行好這種世界革命領導者的義務，而是借社會主義運動的世界主義之名搞大國沙文主義、行帝國主義之實。所以，第三世界與

① 毛澤東：“論人民民主專政”，《毛澤東選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第4卷，第1472—1473頁。

② 周揚：“在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報告”，《周揚文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5），第2卷，第84頁。

第一世界的對立仍然是兩極對立，第二世界是第三世界聯合爭取的對象，兩極對立世界的格局仍然是清晰的。

中國文論界接受兩極對立的世界意識，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建立起階級分析的立場，分清哪些文論是無產階級的、為工農兵服務的，哪些文論是資產階級的（甚至封建的）、反動的、應該批判和肅清的。二是對世界上的不同文論（文化）進行區別對待，蘇聯文論以及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文論是應該學習的，現代資產階級的文論則是應該批判的，特別是唯心主義文論更應該徹底批判，而西方古典文論作為人類文明的遺產則是可以批判地吸收利用的。三是學會用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觀點和方法指導自己的文論研究，從而可以對西方文論進行批判的瞭解，特別是對馬克思主義理論中重點討論的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文論進行深入研究。這在某種意義上成為中國文論界瞭解西方、形成世界意識的最常見的途徑。

樹立兩極對立的世界意識，主要通過兩種方式進行。首先，對那些具有西方教育背景的人進行思想改造，幫助他們建立起正確的世界意識，認清自己以前的世界意識的錯誤，典型例子是朱光潛（1897—1986）的自我批判。他在用階級論否定自己以前的理論觀點時，並不否認西方世界存在着各種複雜的哲學美學理論，祇不過把這些理論劃入了資產階級唯心主義理論陣營，是為資產階級服務的。他說道：“我的《文藝心理學》《談美》《詩論》之類書籍，本是從唯心觀點出發的，與中國過去封建的文藝思想，與歐美許多反動的哲學、美學、心理學和文藝批評各方面的思想，都有千絲萬縷的聯繫。我在唯心陣營裏基本態度是調和折衷的，‘補苴罅漏’的，所以思想系統是駁雜的，往往自相矛盾的……我的文藝思想是從根本上錯起的，因為它完全建築在主觀唯心論的基礎上。主觀唯心論根本否認物質世界，把物質世界說成意識和思想活動的產品，誇大‘自我’，並且維護宗教的神權信仰，所以表現在文藝方面，它必然是反現實主義的，也必然是反社會，反人民的。”<sup>①</sup>朱光潛在歐洲學習的西方理論，在進入兩極對立的世界格局後，不是銷毀和遺忘，而是批判和否定。需要特別指出的是，所謂兩極對立的世界，並非祇有無產階級的世界，而是無產階級反對資產階級世界。這也說明，20世紀50—70年代，中國文論界並不是封閉在一個坐井觀天的空間裏。至於兩極對立中由於批判資本主義而導致對西方資產階級理論的禁忌，則是對立形成的流弊，並不是兩極對立的世界意識的必然結果。

其次，對年輕一代世界意識的培養。主要通過北京大學文藝理論研究班（邀請蘇聯專家畢達夫授課）、北京師範大學文藝理論研究班（由黃藥眠主講）、中國人民大學文藝理論研究班（由周揚、何其芳主講），培養了新中國第一代文藝理論研究者。通過對蘇聯文學理論和毛澤東文藝思想的認真學習，他們在確立馬克思主義文論主導地位的同時，也受到兩極對立世界意識的深刻影響。周揚在描述中國文學理論界形成符合時代要求的世界意識時說：“中國人民，不論在解放之前或者在已經取得偉大勝利之後，總是經常地從蘇聯文學中吸取鬥爭的信心、勇氣和經驗。在這個文學中，我們看到了世界上前所未有的一種最先進的、美好的、真正體現了人間幸福的社會制度，看到了人類最高尚的品格和最高尚的道德的範例。蘇聯文學的強大力量就在於：它是站在共產主義思想的立場上來觀察和表現生活，善於把今天的現實和明天的理想結合起來，換句話說，它的力量就在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現在已成為全世界一切進步作家的旗幟，中國人民的文學正在這個旗幟之下前進。正如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是無產階級社會主義世界革命的組成部分一樣，中國人民的文學也是世界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文學的組成部分。”<sup>②</sup>作為當時中國文學理論研究領域的管理者，周揚的這段論述勾畫出來的世界圖景十分清晰。蘇聯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理論代表了世界上最先進的理論，中國文學與理論研究也應該納入這個世界圖景中。

① 朱光潛：“我的文藝思想的反動性”，《朱光潛全集》（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89），第5卷，第12頁。

② 周揚：“社會主義現實主義——中國文學前進的道路”，《周揚文集》，第2卷，第182頁。

這種兩極對立的世界意識呈現在文論話語中，主要有三個方面：其一，以意識形態為核心，作為區分文論內容先進與否的標準。即使在中蘇同盟分裂後，文論領域中的蘇聯模式和體系因其建構了中國文論的基本架構而依然產生影響，世界意識的結構也沒有出現根本性改變。在價值論意義上，將現代西方文論中諸多理論家都判定為落後的，並分析出他們理論中不符合馬克思主義的各種局限，而對於亞、非、拉國家的文論家則採取了團結的態度。例如，具有廣泛影響的《古典文藝理論譯叢》中就有一本東方文論的專輯，印度、日本等國家的文論被納入了中國文論家建構出來的世界文論版圖中，作為反對西方帝國主義鬥爭的一個部分來發揮作用。

其二，對西方文論的批判性分析主要採用了三個標準：（1）對馬克思、恩格斯（F. Engels, 1820—1895）等經典作家論述過的理論家，按照經典論述進行分析。（2）採用厚古薄今的標準，西方古典理論家反而比現當代理論家更受重視。這種傾向從叢書《文藝理論譯叢》的變化以及其內容的比例可以清晰地反映出來。作為這一時期翻譯介紹外國文論的主要出版物，其中現當代文論祇有不到十分之一，說明當時文論界對於現代西方文論是迴避的。（3）對西方文論無論古今均採用階級分析的立場和方法，用階級對立的分析模式建構出一個縱貫古今的世界圖景。當然，在這個世界圖景中，古典理論家祇要沒有直接貶低勞動階級的言論，其地位要高於被判定為資產階級的現代理論家。這三個批判標準使得中國文論界在形成自己的世界意識時可以自覺地選擇正確的立場，在研究西方文論時避免受到西方理論的不良影響。

其三，兩極對立的世界意識並沒有完全阻礙中國文論界對西方文論的瞭解與運用。儘管這種研究與運用是有風險的，但是在“洋為中用”的原則下批判地研究還是允許的。在這種有限的範圍內，1957—1966年，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出版了《文藝理論譯叢》《古典文藝理論譯叢》《現代文藝理論譯叢》，並出版了“外國文藝理論叢書”，主要收入了十月革命以前的西方文論經典名著。這些輯刊和著作為中國文論界瞭解世界提供了一個視窗，也為中國文論界建立更準確的世界意識提供了寶貴的材料。儘管對這些西方文論免不了要進行批判分析，但它們的出版本身已經成為世界文論版圖中重要的一環，吸收這些西方文論中的觀點成為建構世界意識的一種方式。

## 二 和解的世界意識

進入20世紀80年代，中國文論中的世界意識呈現出另一種面貌。隨着思想解放和對外開放大潮的興起，80年代的文論界普遍渴望瞭解世界，特別是西方文論。當時，中國文論中世界意識的核心內容是渴望融入世界，而不是與西方對立。

中國學者對這個和解的世界的論述，至少包括了三層含義：（1）改變對立思維，不再以階級論為依據來認識世界格局，而是對世界採取開放、包容的態度，而化敵為友是這個和解的世界的基本前提。因此，中國不僅與美國和解，也與蘇聯和解。（2）認識到了幾十年來世界發生的巨大變化，認識到了中國與世界的差距，所以，在和解的世界中，既包含了對西方社會發展進步的欽慕，也包含了希望融入世界、趕上世界發展的步伐，甚至還出現了把西方等同於世界的極端觀念。（3）在“和解的世界”理論中，文化主體性與政治上的自主性仍然存在。政治與軍事的對立轉變為發展中國家在經濟上與發達國家相互合作，所以，在和解的世界中，經濟上的合作是基礎，政治、文化上的自主性則是合作的底綫。和解是獨立自主的民族國家之間為了發展經濟而進行的合作。

這種和解的世界意識在文論中呈現為幾個顯著特點：首先，形成一種世界文學的視野，大膽地將理論命題放在世界文學的範圍內進行論述。例如，九歌的《主體論文藝學》中就這樣來論述他們對文論建設的構想：“祇有確立了建設整個人類精神文明和發展人類智慧的基本出發點，打破唯我獨尊的封閉保守觀念，纔能確立起對待西方現代文藝學的正確態度，從而使跨文化借鑒成為吸收而不是批判。我們主體論文藝學的跨文化借鑒正是這樣做的：我們吸收了克羅齊的直覺表

現說，把文學本質的探討深入到人的精神活動領域，提出文學主體在其活動中完全應該以自由的心態創造出具有個性的對象化世界的文學活動理論；我們吸收了弗洛伊德的無意識理論，深入到作家創作的內在精神淵源，來研究文學活動主體的主體結構；我們吸收了伊塞爾、英伽登、姚斯等人的接受理論，把讀者作為文學活動的第二主體來研究讀者的作用，因為我們認為這些理論是人類的智慧，吸收它們有利於全人類的發展和精神文明建設。”<sup>①</sup>這個構想中包含兩個訴求，其一是對全人類的發展和精神文明建設做貢獻，其二是吸收而不是批判西方現代文論。但是，這個構想卻忽略了不同的西方理論之間的巨大差異，也忽略了人類智慧的差異性，而是籠統地把這些不同的理論放在一個跨文化的世界文論中。這是和解的世界的典型特徵。當然，這種世界文學視野的形成並非某一個人所為，而是那個時代特定的思想氛圍建構出來的。朱厚澤在80年代時就已指出：“重要的不在於中、外、東、西之分，重要的在於按照四個現代化的要求，按照兩個文明建設的要求，按照建設高度民主、高度文明的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的要求，來對待問題。一切有利於這個建設的東西，無論是古今中外的，都應該積極地加以吸取。”<sup>②</sup>在這種和解的氛圍中，文論界以開放的視野吸收外國理論，對世界格局的看法比前一個時期更加靈活。

其次，主動“植出”的思維方式。“植出”是一種現代文化現象，在現代文化形成的過程中，無論是人的思想觀念還是感受經驗，都經歷了一個從地方的限制中脫離出來進入一個更廣闊空間的過程。這是一個脫離地方經驗，在一個更廣闊的空間與更大的人群進行交流的現象。80年代的中國文論中，面向世界、走向世界的觀念就是這種“植出”思維的直觀表達，也是一種主動走向更廣闊世界舞臺的強烈追求。具體表現在學習西方文化思想的迫切心理和將中國文化融入世界的熱切願望。關於前者，1980年李澤厚在《美學譯文叢書序》中說道：“現在有許多愛好美學的青年人耗費了大量的精力和時間苦思冥想創造龐大的體系，可是連基本的美學知識也沒有。因此，他們的體系或文章經常是空中樓閣，缺乏學術價值。這不能怪他們，因為他們根本不瞭解國外現在的研究成果和水平。這種情況也表現在目前的形象思維等問題的討論上。科學的發展必須吸收前人和當代的研究成果，不能閉門造車。目前的當務之急就是應該組織力量儘快地將國外美學著作大量翻譯過來。我認為這對於徹底改善我們目前的美學研究狀況具有關鍵的意義。”<sup>③</sup>翻譯的目的是為了儘快瞭解外國的研究狀況，避免產生空中樓閣式的沒有學術價值的所謂成果。這實際上就是要讓中國學者形成國際視野，把自己的學術研究放在一個國際舞臺上，產生能與國外學者對話的具有“學術價值”的成果。然而，形成世界性的開放視野，僅僅是“植出”的第一個階段。將中國傳統文論與西方文論對接，以西方的文論解釋中國文論，從而使中國文論融入一個更大的學術場域，則是“植出”的第二個階段。其典型案例是王明居用審美心理學中格式塔理論解釋“意象”，認為“象外之象”的產生“與審美主體進行審美觀照時的格式塔心理狀態有關”<sup>④</sup>。當然，在“植出”的同時，也出現了把西方等同於世界、用西方文論剪裁中國文論的生搬硬套。對此，楊明照在為曹順慶《中西比較詩學》一書所寫的序言中指出：“的確，要想將中國古代文論介紹出去，讓世界充分認識，勢必需要進行比較，因為有比較纔有鑒別。祇有通過比較，我們纔可以用雄辯的事實，證實中國古代文論的巨大理論價值及其在世界文論史上的重要地位，纔可以用雄辯的事實，糾正那種‘言必稱希臘’，一切以歐洲文論為價值中心的錯誤偏見，從而恢復歷史的本來面目。各國文論纔可能在平等的基礎之上，互相取長補短，共同去探討世界文學藝術的基本規律。”<sup>⑤</sup>這種通過比較研究讓中國文論與外國文論取長補短，共同探討世界文學藝術的基本規律的構想的基本前提就是承認世界已和解，不再分為兩大對立的陣營。在這種和

① 九歌：《主體論文藝學》（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9），第496頁。

② 朱厚澤：“文化氣氛和文化開放”，《讀書》6（1986）：10。

③ 李澤厚：“美學譯文叢書序”，《走我自己的路》（合肥：安徽文藝出版社，1994），第120頁。

④ 王明居：“象外之象——無中生有”，《文藝理論研究》11（1989）：72。

⑤ 楊明照：“運用比較的方法研究中國古代文論”，曹順慶《中西比較詩學》（北京：北京出版社，1988），第4頁。

解的背景下，中國文論纔被“植出”中國本土的經驗，進入到全球一體的知識場域中。

再次，是全稱論述的形成。即在表達觀點和思考問題時，以全人類的共同性為表達對象，主體是大寫的全人類共同的主體，文學也是全人類共同的文學，理論也是對全人類共同問題的論述。這種全稱論述中所隱含的世界意識，是一個長期對立之後走向和解的樂觀主義，是天下一家的求同意識。1986年，林興宅在論述系統論對文藝研究的作用時指出：“系統科學方法具有解決多因素的、動態複雜系統的有效性，這種有效性將使系統科學方法成為揭開藝術作品的系統狀態和創作—欣賞的系統運動的奧秘的有力工具。系統科學方法能在電子計算機的配合下有效地處理多因素、動態、複雜的系統……而藝術這一雜色系統是一個多參數和多變數的複雜系統，藝術的創作和欣賞這一動態系統帶有很大的隨機性和模糊性，祇有用系統科學方法纔能逐步揭示它的秘密。”<sup>①</sup>他當時已經認識到，文藝現象的複雜性不僅來自作品本身的千變萬化，而且來自創作與欣賞都處在一個多變的社會化系統中，因此，用系統科學的方法就可以把握住複雜的文藝現象，揭示出它的規律和奧秘，而這些規律和奧秘對於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時代都是相同的，古今中外概莫能外。這種全稱論述在文學主體性理論中表現得也十分突出。九歌在《主體論文藝學》中論述文學對人的建構功能時說：“誠然，我們並不否認以往流行的文論所強調的文學的認識、教育和審美作用，祇是感到不應忽略‘人是目的’這一最高價值尺度，僅僅看到文學作為生活教科書的意義。針對這種缺陷，提出主體文學活動的功能是對人的建構，正是力圖把文學活動與人的發展統一起來，使文學的效應回歸到人的內心，回歸到人的精神發展的歷程中，恢復文學最基本的功能，體現文學促使人類自身不斷完善的意義。”<sup>②</sup>這裏說的“人”是超越歷史、階級、性別、民族、年齡的抽象的人，全稱的論述把人抽離了具體的語境。在這樣的全稱論述中，世界是一個統一的整體，不同民族國家的區分可以忽略，文學成為一個超越了民族差異的思考對象。

### 三 多元文化的世界意識

20世紀90年代至21世紀頭十年的二十年中，中國文論中的世界意識出現了明顯不同於80年代的新變化，即以多元文化世界代替了和解的世界。

多元文化世界意識主要是通過後殖民主義批評與西方中心主義批判、中華性與文論失語症，以及文化認同與文化差異、和而不同的文化戰略構想這幾個重大問題的討論表現出來的。與80年代的和解意識中普遍的樂觀主義明顯不同，在這些重大問題的討論中，不同觀點產生了激烈的論爭，顯示出了這二十年裏中國文論中的一種新的世界意識。

“多元文化的世界”主要包括如下幾個基本理念：（1）世界是由各民族不同文化構成的，不同文化之間應該平等相待、和平共處，文化之間的差異應該得到尊重；世界是一個多元文化的世界，不同文化應該遵守“和而不同”的原則，不應該由某種強勢文化去同化或消解其他文化。

（2）強調中國文化的獨特性，甚至是一種例外性。在面對全球化浪潮衝擊的時候，多元文化世界意識認為中國應該有自己的發展道路，中國要建設的是另類現代性，是中國特色的現代化，它把中國文化認同作為一種全球化時代的自覺追求。文論界所提出的“中華性”概念、文論失語症問題都是這種對中國文化獨特性的表達。（3）“多元文化世界”的理論仍然承認開放的必要性，所以中國仍然積極地爭取加入世貿組織、爭取申辦奧運會。但是，多元文化的世界是一個有中國參與的世界，中國是以自己的獨特性加入世界體系的。高建平認為：“我們也可以建立一種普世性。相對於過去西方人建立的普世性，這是另一種普世性。普世性也可以是複數的。世界文化的多樣性最終會由於國際文化的交流的日益普遍，越來越變得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而成為世界

① 林興宅：“論系統科學方法論在文藝批評中的運用”，《超越舊模式》（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3），第69頁。

② 九歌：《主體論文藝學》，第284—285頁。

文化的多元性。發源於我們自身傳統，在我們自身的實踐中發展起來的美學理論，經過我們的努力，最終會獲得一種世界性，成爲多元世界中的一元。”<sup>①</sup>他的這個論點代表了中國文論界對多元文化世界的基本立場。

在這二十年裏，中國文論界以三種形式呈現出多元文化的世界意識。首先，以新的世界意識爲前提。正是到了90年代以後，中國文論中的世界意識纔真正覺醒，纔把“世界”作爲一個問題進行認真討論，並試圖描述所構想的世界圖景。而這個“世界”，不再是80年代文論中那種浪漫想象中呈現出的樂觀和解的世界，而是一個被西方霸權壟斷的世界，是一個多元文化糾纏不清、又被西方霸權主宰的世界。失語症問題的提出者曹順慶憂心忡忡地說：“中國現當代文壇，爲什麼沒有自己的理論，沒有自己的聲音？其基本原因在於我們患上了嚴重的失語症。我們根本沒有一套自己的文論話語，一套自己特有的表達、溝通、解讀的學術規則。我們一旦離開了西方文論話語，就幾乎沒辦法說話，活生生一個學術‘啞巴’。想想吧，怎麼能期望一個‘啞巴’在學術殿堂裏高談闊論！怎麼能指望一個患了嚴重學術‘失語症’的學術群體在世界文論界說出自己的主張，發出自己的聲音！一個沒有說出自己學術話語的民族，怎麼能在這世界文論風起雲湧的時代，獨樹一幟，創造自己的有影響的文論體系，怎麼能在這各種主張和主義之中爭妍鬥麗！”<sup>②</sup>他的這段話表達了三層意思，一是世界（文論）舞臺上存在着各種主義，這是一個多元的世界；二是這個舞臺上沒有中國的聲音，但中國恰恰應該有自己的聲音；三是中國本應有的聲音都變成了模仿西方的聲音，中國唯有反對模仿西方，纔可能發出自己的聲音。從這些表述中可以看出，中國文論失語症的理論前提是對中國無法在一個多元文化的世界上發出自己聲音的焦慮。

其次，多元文化世界意識是以中國文化本位主義爲理論目標的，反過來看，各種對中國文化本位的提倡都把中國放在一個多元文化世界之中。在全球與地方的關係中，中國文化本位論者雖然更強調地方，但都是在全球多元文化背景之中來突顯中國文化地方性的。例如，在闡述“中華性”概念的內涵時，學者們將自己的觀點概括爲三個要點：（1）與現代性主要用西方的眼光看世界不同，中華性意味着多角度的審視，其中特別是要用中國的眼光看世界，更強調把世界看成有多種差異，可以多次劃分的世界。（2）與現代性預想的讓中國完全化爲西方、融入西方而達到普遍的人類性不同，中華性珍視自己作爲人類一分子的文化資源，力求達到一般人類性的最高度，同時又一定要爲世界提供多樣性。（3）中華性具有一種容納萬有的胸懷，它嚴肅地直面各種現實問題，開放地探索最優發展道路。不問社與資、東與西、新與舊，有利的就拿來，有弊的就懸擱拒斥。而這種中華性最終的落腳點，則是建立中華文化圈。<sup>③</sup>這樣的論述中已經清晰地表達了一種多元化的世界觀念。強調中國文化雖然是立足點和最終目標，但是其論述的背景和基礎卻是將中國放在一個多元文化的世界之中，讓中國能屹立於世界多元文化之林，強調中國文化的自強自立，其實是爲了讓這個多元文化的世界更完善。少了中國文化，多元文化世界就不完整了。值得注意的是，幾位作者在此強調了文化差異的重要性，多元文化世界是以文化差異爲理論基礎的；之所以要提倡從現代性走向中華性，也是因爲在現代性建設中，中國文化幾乎被西方同化了，失去了自身的特性（即差異性）；從現代性向中華性轉變，就是要讓多元文化世界的差異性更明顯地表現出來。總之，在中華性的背後是一個多元文化的世界圖景。

再次，文化身份危機的討論折射出自我定位的困惑。文化身份危機的討論是90年代以來中國文論中中國文化本位主義論述的深化。文化身份的危機是對自我認同的焦慮的直接表達。90年代以來，隨着中國對世界經濟與政治的介入越來越深，在這個世界大舞臺上如何定位自己的角色變得越來越緊迫。現實的狀況是，中國在這個世界體系中的定位並不清晰，地位也不相稱，文化身

① 高建平：《全球與地方：比較視野下的美學與藝術》（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第13頁。

② 曹順慶：“文論失語症與文化病態”，《文藝爭鳴》2（1996）：51。

③ 張法、張頤武、王一川：“從‘現代性’到‘中華性’”，《文藝爭鳴》2（1994）：18。



份危機由此產生。當然，這種身份危機也與文化保守主義者提出的文化傳統的失落（包括文論失語症）的問題直接相關，形成了文化身份危機中的傳統與現代之間的緊張關係。但由於“現代”又被文化保守主義者等同於西方，所以中國文化身份的危機說到底仍然是中國文化在世界體系中的定位危機。周憲指出：“我們不妨把全球化視為引發並自覺到差異的過程，引發自我認同的反思與追問的過程，這一過程不可避免地會引發認同的危機。”<sup>①</sup>如果把身份認同問題放在全球化的語境中進行思考時，所討論的不光是在個體心理層面建構自我的問題，而是一個在多元文化世界中為自我尋找一個合理合法的地位問題。與回歸中國文化本位的保守主義立場不同，文化身份研究明顯具有開放性和靈活性。周憲看出了以差異為立論基礎的多元文化主義的保守傾向，指出：“多元文化主義一方面是對各種文化的平等存在合理性的關注，另一方面又暗含着多元並存的條件下對本我文化的強調和讚美。”<sup>②</sup>但是，他並不同意這種借差異之名對文化本位的保守態度，而是借用了霍爾（S. Hall, 1932—2014）的身份建構理論，把身份認同當成一個動態的過程：“我想特別指出的一點是，全球化語境中的文化認同首先是一個開放發展的過程，是一個不斷豐富和多樣化的過程，不必也不可能簡單地返歸過去。”<sup>③</sup>“嚴格地說，文化傳統本身也不是鐵板一塊，而是複雜的和多元的，那種設想有一個單一純粹的文化源頭並可以回到它上面去的想法是絕對不現實的。肯定差異性及其合法化，最終的目的不是先承認一種文化或一種價值的合法性，而是肯定不同文化及其價值的合法性。”<sup>④</sup>可見，認同研究的價值立場也是肯定多元文化存在的意義，但是去除了對回歸中國文化純正性的幻想。在身份認同研究中，明智的態度是自覺地把中國文化放在一個多元文化的世界上，謙和地與其他文化和平共處。

最後，這一時期的中國文論還出現了對世界文化格局的總體構想，體現出承認多元文化共存的世界意識。90年代以來，不管是文化本位主義還是文化身份論述，都清醒地意識到了中國處在一個世界大舞臺上。如果說文化本位主義與文化身份論述的立足點還是在中國，那麼，如何認識這個紛繁複雜的世界，建構出一套世界文化格局的論述，則是一個迫切的任務。樂黛雲對多元文化世界中和而不同原則的論述，正是對這一世界文化格局的清晰表述：“‘和而不同’就是尊重差別，並在和諧、適度、互動的相互關係中，共求發展。這就是‘和實生物，同則不繼’的道理。祇有‘不同’，纔能在差別的張力和互動中發展創新；如果都相同、都統一，就會泯滅生機，難以為繼。”<sup>⑤</sup>在她的論述中，世界是一個由不同文化構成的多元文化空間，中國文化祇是其中的一元。這個世界上的不同文化都有自己的特色，差異是這個多元文化世界的基本狀態，強調文化差異也就為保持各種文化的自身特點提供了理論基礎。但是，她也明確反對文化部落主義和文化霸權主義，前者將自己的文化封閉起來拒絕與其他文化交往，後者則是以自己的文化強制改變其他文化，導致文化多樣性的喪失。所以，在樂黛雲所描繪的多元文化世界中，不同文化應按和而不同的原則和平相處，和而不同的基礎則是尊重差異。但是，對話交往的過程中的確會出現趨同性，又如何解釋呢？她這樣解釋：“當然，這並不排斥在漫長的社會發展進程中，人們會逐漸形成某些共同的價值標準，但即使是這些為數不多的共同標準，在不同的地區和民族也還有其不同的理解和不同的表現形式。”<sup>⑥</sup>可見，融合的部分還是被差異化解了。在和而不同的世界意識中，“不同”纔是強調的重點，這也是多元文化世界意識中的核心觀念。

#### 四 共同體世界意識

21世紀第二個十年，中國文論中出現了世界主義討論，形成了一種不同於多元文化世界的新

①③周憲：“全球本土化中的認同危機與重建”，《文學與認同：跨學科的反思》（北京：中華書局，2008），第226、237頁。

②周憲：“認同建構的寬容原則和差異邏輯”，《文學與認同：跨學科的反思》，第243頁。

④周憲：“‘合法化’論爭與認同焦慮”，《文學與認同：跨學科的反思》，第210頁。

⑤⑥樂黛雲：《跨文化之橋》（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第4、9頁。

的世界意識，即共同體世界意識。

共同體世界意識是多元文化世界意識的深化與發展。如果說多元文化世界意識強調的是文化差異，那麼，共同體世界意識更強調整合與聯結。“共同體世界”就是把全人類看成一個命運共同體，各種文化處在一個交往對話與融合的過程中，休戚與共。共同體世界的理論內涵至少包括如下三個方面：(1) 共同體是一個整體，不同文化之間有着無法分割的聯繫。它承認各種不同文化具有平等地位，並可以在共同體中發揮各自的作用。(2) 共同體作為一個整體是有共同利益的。它的基本價值立場是提倡共贏，各種文化共同尋找符合共同體成員整體利益的發展道路與具體策略。(3) 共同體是一個超越民族國家和獨特文化的整體。作為一種世界體系，它是全人類共同參與的一個跨文化協同機制。在這個共同體中，各種文化都祇是其中的一個成員、一個要素。任何一個成員都不應因自己的利益而損害整體利益，也不能損害其他成員的利益，任何一個成員又都能從與其他成員的合作中、從共同體中獲益。

與多元文化世界相同，共同體世界也自覺地把中國放在了世界體系之中。但是，兩者的差異卻又非常明顯。主要體現在如下幾個方面：(1) “同”與“異”的區別。多元文化世界強調的是不同文化之間的差異，而共同體世界強調的是各不同文化之間的相通與平等交往。多元文化世界理論雖然也承認不同文化之間應該平等交往，但卻是以各種文化自身的獨特性為前提的，而共同體世界更強調不同文化的整體性。這兩種世界意識雖然都可以用“和而不同”來概括，但強調的重點不同。“多元文化世界”側重於“不同”，而“共同體世界”更側重於“和”（取其融合之意）。(2) “被動”與“主動”的區別。“多元文化世界”以文化差異為依據，防止中國被西方同化；“共同體世界”則主動構建世界問題的中國方案，引領世界走向和平共贏。多元文化世界中，中國處在被動防禦地位，既要參與到世界體系中，又擔心介入太深而失去文化自主性；在“共同體世界”中，中國已成為構建世界體系的主導力量，中國不再擔心失去文化自主性，而且自信地認為可以以中國方式處理人類面臨的共同問題。(3) “自我取向”與“世界取向”的區別。在多元文化世界中，中國文化的自我認同是核心；在共同體世界中，中國文化的全球認同是核心。在多元文化世界論述中，一方面希望加強國人對中華文化的認同，另一方面也希望西方國家承認文化差異，承認中國文化的獨特性；而在共同體世界的論述中，中國文化已走向世界，中國既不獨特，也不神秘，中國不會為了自己的利益而損害他國利益，也不會為了自己的利益而損害共同體的整體利益。中國人建構的共同體世界，是一個人類共享的世界。

這種共同體世界意識，在文論中首先呈現為對世界主義的論述。隨着多元文化主義所帶來的民族主義與保守主義風險越來越為人們警覺，多元文化主義中提倡文化之間對話與開放的一面越來越得到重視。由此所得出的必然結論就是，以世界主義對抗民族主義；或者說，以世界主義引導多元文化主義走向更開放的狀態，以避免陷入民族主義與保守主義的陷阱。世界主義對世界的看法是：世界是一個整體，不同文化之間是相互聯結的，每一種文化都無法孤立存在，祇能在一個不同文化共同構成的空間中與其他文化交流對話，並主動融入人類文化大家庭纔能求得生存與發展。美國學者阿皮亞（Kwame A. Appiah）指出：“如果在一個世界裏，各種群體被清晰地區分開來，那麼，這樣的世界不再被視為嚴肅選擇的結果，即便過去有人這樣認為。對於人類這個不停遷徙的種族來說，隔絕與隱居的生活方式永遠是一種異常的現象。世界主義不是一種違背人性的理論，它拒絕任何違背人性的理論與做法。”<sup>①</sup>這種建立在普遍人性基礎上的世界主義也為中國學者所接受，其中所包含的整體化或一體化的世界觀是世界主義文論的核心內涵。王寧指出，除了為文學創作提供了普遍的永恆的主題和超越特定的民族/國別文學的美學形式外，“世界主義還為文學批評提供了一種廣闊的視野，使批評家得以在一個廣闊的世界文學背景下評價特定

① [美]奎邁·安東尼·阿皮亞：《世界主義：陌生人世界裏的道德規範》（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12），苗華建譯，第14頁。

的文學現象以及作家、作品……文學世界主義便賦予我們一個寬廣的視野，使我們不僅僅局限於本民族的文化和文學傳統，而是要在批評實踐中把目光指向世界上所有民族、國別的優秀文學”。<sup>①</sup>在這種世界主義的視野中，世界是一體的，在不同的民族國家文化之上有一個統一的“世界文化”或“全球文化”。因此，世界主義論述構建出的世界圖景成爲共同體世界意識的核心意涵與基本框架。

其次，與世界主義相關聯的是世界文學討論中對共同體世界的建構。近年來，中國學者主要是受到美國學者丹穆若什（David Damrosch）“世界文學”理論的啓發，而參與到這場國際大討論中的。中國學者對“世界文學”的論述，除了考辯這個概念的歷史淵源與基本含義之外，主要關注的是它對中國文論研究的意義。方維規指出：“中國學術界的有些說法，與世界潮流格格不入，與新的‘世界文學’理論格格不入，也與當今的‘全球文學’或‘世界的文學’格格不入。當前的有些觀點，其本質與歐洲中心主義一脈相承，祇是調轉了方向，很難見它與真正的世界文學還有什麼關係。”<sup>②</sup>那麼，什麼是世界文學？他的回答是：“當代‘世界文學’概念，首先不再強調國族歸屬。這對文學研究來說，也就意味着重點轉移，告別按照語言劃分的國族文學的比較研究。研究重心在於揭示諸多文學及其場域之間的關聯和界綫。”<sup>③</sup>對於文論研究而言，世界文學是一種超越國別、在一個世界的整體關聯中進行研究的思考方法，其中所隱含的當然也是一種世界主義的視角。在世界文學理論中，世界是一體化的，一個超越國族的世界場域是世界文學形成的前提條件。這個場域就是一個共同體世界，世界文學理論爲共同體世界提供了一個文化上的實例。在世界文學論述中，不僅世界文學已被那些超越本民族的語言範圍而在其他民族中產生影響的作品所證實，而且判定一部作品是不是世界文學（世界文學經典）的標準也正在形成。這樣一來，在文學領域，一個“傑作的聯合國”正在被構建，共同體世界在文學領域中就不是烏托邦，而是現實。

再次，在文化輸出的理論闡述中建構了一個由中國主動參與的共同體世界。文化輸出是中國的一項國家戰略，在文論研究領域關於中國文學與文化走向世界的理論闡述中，主動參與人類文化共同體建設是一個核心議題。文化輸出的歷史背景是中國文學與文化被長期邊緣化，並深受西方影響。文化輸出一方面是要讓中國文學與文化獲得更多國家的認可，另一方面是讓中國文學與文化在世界上產生更廣泛的影響。王寧指出：“當中國成爲一個經濟和政治大國時，一個十分緊迫的任務就是要重新塑造中國的文化和文學大國的形象。在這方面，翻譯又在促使中國文學更加接近世界文學主流方面起到了更爲重要的作用……我們當下翻譯的重點無疑應該由外譯中轉向中譯外，尤其是要把中國文學的優秀作品翻譯成世界主要語言——英語，這樣纔能真正打破全球化所造成的語言霸權主義狀況。”<sup>④</sup>在這種走出去的論述中，有一個基本的前提，那就是承認人類文化是一個共同體；中國主動把自己的文學與文化推薦到這個共同體中，是共同建構這個共同體的積極態度。這種積極的態度，是共同體世界意識覺醒的標誌。沒有共同體世界意識的覺醒，可能還會陷在對文化差異孤芳自賞的狀態中，做着文化本位主義的懷舊夢。即使向世界推介中國文學與文化時可能存在着本質主義的取代西方中心的魯莽言論，但這種“走出去”的本質主義也仍然比“走回去”的本質主義更有價值，起碼這種走出去的本質主義已經承認人類是一個共同體了。

綜上所述，從世界意識的角度回顧七十年來的中國文論，可以發現，它始終處在一個世界文論的場域中，自覺不自覺地形成了四種不同形態的世界意識。對這四種世界意識進行反思，還可以發現，“兩極對立的世界”與“和解的世界”這兩種意識，是對一個問題的兩種不同解答，

① 王寧：“‘世界主義’及其之於中國的意義”，《南國學術》3（2014）：41。

②③ 方維規：“敘言·何謂世界文學？”，《思想與方法——地方性與普世性之間的世界文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第30、24頁。

④ 王寧：“‘世界文學’：從烏托邦想象到審美現實”，《探索與爭鳴》7（2010）：8。

這就是以什麼理念融入世界；多元文化世界意識和共同體世界意識則是圍繞另一個問題進行的對話，這就是怎樣融入世界。四種世界意識之間雖然差異很大，卻又前後關聯，構成了一個動態的譜系。從對這兩個問題的不同回答可以得出兩個基本的結論：一是世界意識直接影響中國對不同民族國家文論的認知與接受。隨着世界意識從兩極對立發展為建構命運共同體，中國文論也從排斥西方發展為與所有文化對話。其二，在進入世界文論場域的方式上，保持開放的態度比強調文化差異與文化主體性更有利於文論的發展。祇有選擇與其他民族的交往對話，走出自我文化的封閉空間，纔能通過瞭解其他文化而吸收其有益的成分來發展自己；同時，也為其他文化提供其所需的成份而得到他們的尊重。在一個良性互動的文化關係中融入世界，自我的文化纔能長存，在一個更和諧的全球文化中獲得應有的位置，這纔是一種文化發展的明智之舉。因此，從兩極對立的世界意識走向共同體世界意識，也是順應人類歷史潮流的。

### ·學術微信·

2019年3月25—27日，由中國人民大學主辦，中國人民大學人文社科成果評價中心、中國人民大學書報資料中心承辦的“中國人民大學人文社科成果評價發佈論壇暨學術評價與學科發展研討會”在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如論講堂召開。中國期刊協會會長吳尚之、中國編輯學會會長郝振省、中國人民大學校長劉偉等領導出席了會議。

本次論壇發佈了《2018年度複印報刊資料轉載指數排名研究報告》和《複印報刊資料重要轉載來源機構（2018版）》兩項成果。人文社科成果評價研究界專家學者、學術期刊與學術機構代表九百餘人參會。《南國學術》總編輯田衛平應邀出席，並於2019年3月26日下午到中國人民大學書報資料中心人文編輯部承辦的“學術評價與文藝類期刊質量建設論壇”作學術演講。